

漫说文化丛书

男男女女

黄子平 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男 男 女 女

黄子平 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男女女/黄子平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5

(漫说文化丛书)

ISBN 7-309-04472-X

I. 男…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8752 号

男男女女

黄子平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 晶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浦东东北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96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7-309-04472-X/I · 312

定 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漫说“漫说文化”

陈平原

据说,分专题编散文集我们是始作俑者,而且这一思路目前颇能为读者接受,这才真叫“无心插柳成荫”。当初编这套丛书时,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我们不管。并非故示清高或推卸责任,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纯属“玩票”,不靠它赚名声,也不靠它发财。说来好玩,最初的设想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可以送朋友,也可以搁在书架上。如今书出得很多,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好文章难得,不敢说“野无遗贤”,也不敢说入选者皆“字字珠玑”,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也大致体现了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选家”之事,说难就难,说易就易,这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记得那是 1988 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此前我写过几篇关于林氏的研究文章,编起来很容易,可就是没兴致。偶然说起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以及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这样,1988 年暑假,钱理群、黄子平和我三人,又重新合作,大热天闷在老钱那间 10 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先拟定体例,划分专题,再分头选文;读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当即“奇文共欣赏”;不过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名作”。开始以为遍地黄金,捡不胜捡;可沙里淘金一番,才知道好文章实在并不多,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开学以后又泡图书馆,又翻旧期刊,到 1989 年春天



才初步编好。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不想随意敷衍几句,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而这又是颇费斟酌的事。一开始是“玩票”,越做越认真,变成撰写 20 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的。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这迟到的礼物,最大的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居然“大动干戈”,脸红耳赤了好几回,实在不够洒脱。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好笑。总有人问,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就编了这几本小书,值得吗?我也说不清。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兴致,不能老是计算“成本”和“利润”。惟一有点遗憾的是,书出得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看。

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而其根本则是我们对“散文”的独特理解。从章太炎、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贾平凹,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目的是借此凸现 20 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鲁迅说五四文学发展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守旧出新,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杂拌儿跋》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这点很有见地。但如以散文为例,单讲输入的速写(Sketch)、随笔(Essay)和“阜利通”(Feuilleton)固然不够,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魏晋的清谈,唐末的杂文,宋人的语录,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

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五四时抬出“美文”的概念,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

就,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却总归不是嫡系。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比喻和形容词,甜得发腻,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浓得化不开”。至于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疏淡的闲话,有点苦涩,有点清幽,虽不大容易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辞藻,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这种雅致与潇洒,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学养,一种无以名之但确能体会到的“文化味”。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更讲浑然天成,更难造假与敷衍,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悟性与意趣——因其“技术性”不强,很容易写,但很难写好,这是一种“看似容易成却难”的文体。

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

当然,这只是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读法,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另外的读法。在很多场合,沉默本身比开口更有力量,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淘汰了不少名家名作,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愤怒。无意故作惊人之语,只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眼光和趣味,再加上“漫说文化”这一特殊视角。不敢保证好文章都能入选,只是入选者必须是好文章,因为这毕竟不是以艺术成就高低为惟一取舍标准的散文选。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有个性有锋芒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见的“漫说文化”。

1992年9月8日于北大

附记

旧书重刊,是大好事,起码证明自己当初的努力不算太失败。十五年后翩然归来,依照惯例,总该有点交代。可这“新版序言”,起了好几回头,全都落荒而逃。原因是,写来写去,总摆脱不了十二年前那则旧文的影子。

因为突然的情事变故,这套书的出版略有耽搁——前五本刊行于1990年,后五本两年后方才面世。以当年的情势,这套无关家国兴亡的“闲书”,没有胎死腹中,已属万幸。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十册小书出版后,竟大获好评,获得首届(1992)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选题一等奖。我还因此应邀撰写了这则刊登在1992年11月18日《北京日报》上的《漫说“漫说文化”》。此文日后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漫说文化》(1997)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2004),流传甚广。与其翻来覆去,车轱辘般说那么几句老话,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引入这则旧文,再略加补正。

丛书出版后,记得有若干书评,多在叫好的同时,借题发挥。这其实是好事,编者虽自有主张,但文章俱在,读者尽可自由驰骋。一套书,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让其体悟到“另一种散文”的魅力,或者关注“日常”与“细节”,落实“生活的艺术”,作为编者,我们于愿足矣。

这其中,惟一让我们很不高兴的是,香港勤+缘出版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购得该丛书版权,然后大加删改,弄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刚出了一册《男男女女》,就被我们坚决制止了。说来好笑,虽然只是编的书,也都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不希望被人肆意糟蹋。



漫说文化丛书

也正因此,每当有出版社表示希望重刊这套丛书时,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保持原貌。因为,这代表了我们那个时候的眼光与趣味,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神采飞扬的八十年代,其优长与局限具有某种“史”的意义。很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除了体谅我们维护原书完整性的苦心,还答应帮助解除人文版印刷不够精美的遗憾。

2005年4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导读

黄子平

从本世纪卷帙浩繁的散文篇什中编出一本十来万字的、谈论“男与女”专题的、带点儿文化意味的集子，不消说是一件虽然困难却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散文，是一个文体类别的概念。男女，则是一个性别概念。把这两个概念搁一块儿考虑有没有什么道理？世界上的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琢磨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性别(gender)和文类(genre)来自同一词根，它们在文学史上的联系几乎就像其词源一样亲密。”由此，人们讨论了“小说与妇女”这一类极有吸引力的课题，指出某一些文体类型更适合于成为“综合女性价值”的话语空间，等等。但是，也有另外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不同意这种基于词源学的观点来展开逻辑论证的方法，说是“你能根据‘文类’与‘性别’源于同一词就证实它们有联系的话，你也能证实基督徒(Christians)和白痴(cretins)有联系，因为它们皆源于拉丁语‘信徒’(christianus)。”当然，一种方法的滥用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它在其一定范围内的有效性已经失灵：词源学上的联系仍然是一种联系，而且也就投射了一种概念上、观念上和思想史上的可能相当曲折的联系。避开拉丁语之类我们极感陌生的领域，回顾一下我们中国自己的“文体史”和“妇女史”，也能觉察出“文类之别”和“男女之别”，实际上是处于同一文化权力机制下的运作。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可以说与伦理道德教化体制一齐诞生。《周礼·大祝》曰：“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

曰诰，四曰会，五曰禘，六曰谏。”在《礼记》一书中，还对某些文体的使用范围加以规定，比如“谏”：“贱不谏贵，幼不谏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谏之。诸侯相谏，非礼也。”把文类看作仅仅是文学史家为了工作的便利而设置的范畴归纳，而看不到其中包含的文化权力的运作，就太天真了。每一个时代中，文类之间总是存在着虽未明言却或井然有序或含混模糊的“上下亲疏远近”关系，有时我们称之为“中心—边缘”关系。直至今日，当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综合性文学刊物都罕有将“散文”或“抒情短诗”置于“头条位置”时，文类之间的上述不成文的“伦理”秩序就昭然若揭了。有时我们能听到这样的传闻，说是从事剧本创作的文学家在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尴尬地发现自己“掉在了两把椅子中间”，在“剧协”中无法与著名导演、名角、明星们平起平坐，在“作协”中又被小说家和诗人们所挤兑。他们呼吁成立专门的“戏剧文学家协会”，正表明了某一文类在当代文化权力机制中的困窘地位或边缘位置。如果我们由此联想到别的一些代表大会中要求规定女性代表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百分比，这种联想多少总是有点道理的了。

同样，“男女之别”决不仅仅是生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划分，而首先是文化的和政治的划分。正如西蒙娜·波伏瓦所说的，女人绝非生就的而是造就的。从中国古典要籍中可以不太费力地引证材料来说明这一点。《通鉴外》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俚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礼记·郊特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大戴》：“妇人，伏于人者也。”《说文》：“妇，服也。”在两千年的父权文明中，“男女之别”不单只是一种区分，而且是一种差序，一种主从、上下、尊卑、内外的诸种关系的规定。

这样，当我们把文体类别和性别这两个概念搁一块儿考虑的时候，那个作为同一位“划分者”的历史主体就浮现了，那位万能的父亲形象凸显于文化史的前景。更准确地说，任何划分都是在“父之法”的统治下进



行。既然“男与女”是文学、文化、伦理等领域无法回避、必然要谈论的主题，父系社会就规定了谈论它的方式、范围、风格、禁忌等等。周作人曾经谈到中国历来的散文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载道”的东西，一类则是写来了消遣的。在前一类文章中也可以谈“男女”，却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其文化主要是伦理教科书之类的形式。父系文明甚至不反对女才子们写作这类东西，如班昭和宋若华们写的《女诫》、《女论语》之类。更多的涉及“男女”或曰“风月”的作品，却只能以诗词、传奇、话本、小说这类处于话语秩序的边缘形式来表达。被压入幽暗之域的历史无意识借助在这后一类话语中或强或弱的宣泄，调节着消解着补充着润滑着整个文化权力机制的运作。

现在要来说清楚编这本散文集的“十分有意思”之处，就比较容易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动。相应地，文体类型的结构秩序也产生了“中心移向边缘、边缘移向中心”这样的位移错动。正统诗文的主导地位迅速衰落了，小说这一向被视为“君子弗为”的邪宗被时人抬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吓人位置，担负起“改良群治”、“新一国之民”的伟大使命。新诗经由“尝试”而终于“站在地球边上呼号”。戏剧直接由域外引进，不唱只念，文明戏而至“话剧运动。”这期间散文的命运最为沉浮不定。它既不像小说那样，起于草莽市井而入主宫闱；也不像新诗那样，重起炉灶另开张，整个儿跟旧体诗词对着干；更不像话剧那样，纯然“拿来”之物，与旧戏曲毫无干系（至少表面看来如此）。说起来，在中国整个文学遗产中，各类散文作品所占的比重，比诗歌、小说、戏曲合在一起还大。而所谓散文这一类型概念本身的驳杂含混，足以容纳形形色色的文体，诸如古文、正史、八股文等较占“中心位置”的文体，又包含小品文、笔记、书信、日记和游记一类位于边缘的类型。因此，在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体结构变动中散文的位移时，就无法笼统地一概



而论。借用周作人的范畴,我们不妨粗疏地说“载道之文”由中心移向边缘,而“言志之文”由边缘移向中心。其间的复杂情形无法在这里讨论,譬如书信、日记、游记之类渗入到小说里去暗渡陈仓,或者反过来说,小说在向文体结构的“最上乘”大举进军时裹挟了一些边缘文体咸与革命。有一点可以说说的是,以前人们用“文章”这个名目来概括上述形形色色的文体,如今已觉不太合适。至少,古代文论中通常指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文文体的“散文”,被提出来作为西方的 Pure prose 的译名,并产生持续相当久的命名之争。周作人呼吁“美文”,王统照倡“纯散文”,胡梦华则称之为“絮语散文”。或者译 Essays 称为随笔,或者袭旧名叫作小品,或者干脆合二为一,如郁达夫所说的,“把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的四个字连接在一气,以祈这一个名字的颠扑不破,左右逢源。”还有一些新起的名目,如杂文、杂感、随想录、速写、通讯、报告文学等等,归入散文这旗帜之下。命名的困难正说明了散文地位的尴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它总是夹在中心与边缘、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广义的文学”、雅与俗、传统的复兴与外国的影响、歌颂与暴露等诸种矛盾之间,有时或许真的“左右逢源”,更多的时候是左右为难。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十年,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无不认为比之小说、新诗、戏剧、散文取得的成就最为可观。而可观的原因,却又恰好不是由于他们所极力主张的反传统,而是由于可依恃的传统最为丰厚深沉的缘故。可是没过多久,讨论起“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这样的大问题时,鲁迅就不得不起而为杂文和杂文家辩护,争论说,与创作俄国的《战争与和平》这类伟大的作品一样,写杂文也是“严肃的工作”。在鲁迅身后,“重振散文”、“重振杂文”、“还是杂文的时代”一类的呼声,其实一直也没有中断过。散文的“散”、“杂”、“小”、“随”等特征,说明了它的不定型、无法规范、兼容并蓄,时时被主流所排斥等等,与其说是必须为之辩护并争一席之地,毋宁说恰恰是散文的优势之所在,它藉此得以时时质疑主流



意识,关注边缘缝隙,关注被历史理性所忽视所压抑的无意识、情趣和兴味,从而可能比小说、诗、戏剧等文体更贴近历史文化主体及其精神世界的真实。

不消说,文体结构的错动只是二十世纪社会文化伦理诸结构大变动中的一个部分。周作人曾认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二十世纪初,随着王权的崩溃,父权夫权亦一齐动摇。五四时期讨论得最多的热门话题,便是“孝”和“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那个“节”)。男女之别不仅在差序尊卑的意义上,而且在分类的意义上受到质疑。“我是一个‘人’!”女权首先被看作人权的一部分提了出来,幼者与女性一视同仁(人)地被当作“人之子”而不是儿媳或儿媳之夫被置于反抗父权文化的同一条战壕之中。妇女解放始终没有单独地从“人的解放”(随后是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大题目中提出来考虑,遂每每被后者所遮掩乃至淹没。如同处于错动的文体秩序中沉浮不定的“散文”,变动的社会结构里,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身处诸种复杂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经历了惊人的变化,并且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另一方面,妇女事实上承受的不平等至今仍随处可见,某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如长途贩卖妇女)。你会问,社会和阶级的解放能否代替妇女及其女性意识的解放,或者说后者的不如人意正证明了前者的“同志仍须努力”?另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趋向是,到了二十世纪末叶,与欧美的女权主义者正相反,中国的女性似乎更强调“女人是女人”,这一点似乎亦与本世纪初的出发点大异其趣。一个流传颇广的采访或许能说明问题。当一位普通妇女被问到她对“男女平等”的理解时,她说:“就是你得干跟男人一样繁重危险的工作,穿一样难看邋遢的衣服,同时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不再给你让座,你下班回家照样承包全部家务。”看来,妇女解放不单充满了诗意,也充满了散文性和杂文性。有意思的是,茅盾曾有短篇小说以《诗和散文》为题,描写了本世纪初的新青年新女性



的爱情婚姻生活。而丁玲的两篇著名杂文,《我们需要杂文》和《三八节有感》,几乎就发表在同一时期的《解放日报》上。所谓杂文,我想,无非是在看似没有矛盾的地方出其不意地发现矛盾,而这“发现”带有文化的和文学的意味罢了。

喜欢处处发现“同构性”的人,倘若生拉硬拽地夸大这里所说的联系,可能不会是明智的。这篇序文只是试图提供一种阅读策略,去看待这本集子中文体方面和论及的话题方面所共有的驳杂不纯性。收入集子中创作时间最早的,是前清进士、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一篇未刊文《夫妇公约》,文中表现的“超前意识”几乎与其文体的陈旧一样令人吃惊。鲁迅早年以“道德普遍律”为据写作长篇说理文,在著名演说《娜拉走后怎样》则提及“经济权”的问题,到了后来,就纯粹用数百字的短文向父权文明实施“致命的一击”了。周作人却一直依据人类学、民俗学和性心理学的广博知识来立论,其文体和观点少有变化。继承了“鲁迅风”且在女权问题上倾注了最大战斗激情的是聂绀弩,《“确系处女小学亦可”》一文取材报章,处女膜与文化程度的这种奇怪换算真使人惊愕,至今,在许多“征婚启事”上此类杂文材料并不难找。徐志摩的演说援引了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先驱、小说家伍尔夫的名作《自己的房间》里的许多观点,却无疑作了出自中国浪漫主义男性诗人的阐释和理解。林语堂仿尼采作“萨天师语录”,梁实秋则在他的“雅舍小品”中对男人女人不分轩轻地加以调侃,然而这调侃既出自男人之笔下,“不分轩轻”似不可能。张爱玲的《谈女人》从一本英国书谈起,把英国绅士挖苦女人的那些“警句”也半挖苦地猛抄了一气,最后却点出她心目中最光辉的女性形象——大地母亲的形象。集子中那组由郁达夫、何其芳、陆蠡、孙犁等人撰写的更具抒情性的散文,或谈初恋,或寄哀思,或忆旧情,可能比说理性的散文透露了更多至性至情,其文体和情愫,借用周作人的话来评说:“是那样地旧又那样地新”,新旧杂陈,难以分辨。关于婚姻、夫妇的散文占了相当篇幅,



其中有关“结婚典礼”的讨论是最有兴味的,仪式的进行最能透露文化的变迁,二十世纪最典型的“中西合璧”式长演不衰,其中因由颇堪玩味。悼亡的主题本是中国古典散文的擅长,朱自清和孙犁是两位如此不相同的作家,写及同一主题时的那些相似相通之处却发人深思。一本谈“男与女”主题的散文集,出自男士之手的作品竟占了绝大部分,这是编书的人也无可如何的事。幸好有新近的两女作家,张辛欣和王安忆的大作压轴,一位“站在门外”谈婚姻,一位却娓娓而叙“家务事”,都能透露八十年代的新信息,把话题延续到了眼前目下。

驳杂不纯,散而且杂。苏联批评家巴赫金有所谓“复调”或“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理论,用于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最为恰当的。就谈论“男与女”的“散文”而言,就更是如此——文体、语言、观念、思想,无不在时空的流动中嬗变、分化、冲突,极为生动,十分有意思。不信,请君开卷,细细读来。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蔚秀园

目 录

- 鲁 迅
 我之节烈观 1
 娜拉走后怎样 9
- 周作人
 狗抓地毯 15
 读《性的崇拜》 18
- 朱自清
 女人 21
- 徐志摩
 关于女子 26
- 周作人
 太监 36
- 林语堂
 萨天师语录(三) 40
- 瞿秋白
 关于女人 43
- 鲁 迅
 女人未必多说谎 45



漫说文化丛书

- 奇怪 47
男人的进化 49
- 聂绀弩
谈《娜拉》 51
“确系处女小学亦可” 54
- 丁玲
三八节有感 57
- 聂绀弩
论娼妓 61
论武二郎 64
- 周作人
女人的禁忌 72
- 张爱玲
谈女人 77
- 梁实秋
女人 87
男人 91
- 周作人
初恋 94
- 何其芳
墓 96
- 郁达夫
水样的春愁 102
- 何其芳
哀歌 108